

中青文库

都市里的搓澡工

农民工迁移与城市适应研究

赵 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青文库 ●

本书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都市里的搓澡工

农民工迁移与城市适应研究

赵 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里的搓澡工:农民工迁移与城市适应研究/赵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61-0560-3

I. ①都… II. ①赵…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6084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高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64073836(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16千字		
定价	3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一所普通高等学校。它于1985年12月在中央团校的基础上成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和团干部培训等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格局。与其他已有百年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入国民教育序列的历史还显得比较短。因此，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浪潮中，尽快提高学校的教学与学术水平就成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关键。2002年，学校制定了教师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条例，旨在鼓励教师的个性化研究与著述，更期之以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涌现。出版基金创设之初，有学术丛书和学术译丛两个系列，意在开掘本校资源及域外精华。随着年轻教师的剧增和学校科研支持力度的加大，2007年又增设了博士论文文库系列，用以鼓励新人，成就学术。三个系列共同构成了对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层次支持体系。

8年来，学校共资助教师出版学术著作近百部，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管理学、新闻与传播等十多个学科。学校资助出版的初具规模，激励了教师，活跃了校内的学术气氛，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2010年，校学术委员会将遴选出的一批学术著作，辑为《中青文库》，予以资助出版，一则用以教师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二则希冀能以此为发端，突出学校特色，渐成风格与品牌。同时，为了倡导并鼓励学生关注社会，重视实践，寓科学研究于专业学习之中，文库还将学校长期以来组织的“智慧星火——中青学子学术支持计划”中的学生获奖作品辑为两本，一并收录在内。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在《中青文库》的编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认真负责，用力颇勤，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

2011年11月

序

赵莉撰写的学术专著《都市里的搓澡工——农民工迁移与城市适应研究》是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底本反复修订而成的。书稿以外流至辽宁省 Y 市的农民工群体——安徽搓澡工为例，在描述其迁移历程的基础上，对该群体在城市的适应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农民工研究是个热门，著作甚多。但当前多数研究者是把不同行业的农民工集中在一起，作为统一的农民工整体笼统地加以介绍，强调农民工同质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差异性，因而忽略对特定行业农民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农民工被“千人一面”地看成是城市中典型的边缘人。即便素来注重分析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人类学者的研究目前也大抵如此。然而赵莉却注意到，农民工是一个异常复杂多元的群体，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她以特殊的关系和身份，成功地进入安徽搓澡工的“圈子”，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并在文中运用细腻的叙事手法，以搓澡工的“生活史”为叙事主线，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真实、生动的搓澡工的生活画卷。

作者对这一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空间的建构主要是基于其实证性的调查资料，在嵌入性社会关系网路的视角下探讨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样态，说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适应是多维度的和多层次的，如经济的、社会交往的、心理的等。此外，作者还对“流动”与“迁移”等概念内涵进行了辨析，对“推拉”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等在适用范围的运用作了一定的探讨，从中也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度，对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真切领会和取舍以及较高的驾驭经验材料的能力。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对赵莉的著作有这样的评价。

从整篇文章的架构来说，作者以历时性的记事手法，以社会网络关系的逐渐形成为主线，将安徽搓澡工在Y市的适应过程展现出来，其脉络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可以说，该书选材新颖、视角独特、内容丰富，作者对农民工不同性状的解读，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学术界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认识。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对象方面：从“异域”转向“本土”，从“乡村”转向“都市”，从“他者”转向“自我”，通过分析一个都市特殊群体如何适应“他乡”社会环境的过程，将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旨趣从一个相对封闭和静态的空间转向了异质性较大的城市，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学研究视野。同时，本书通过对人口并不密集、经济并不发达的城市搓澡工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过去相关研究较少的缺陷，有助于修正以往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2) 研究方法方面：将人类学的“自观”和“他观”方法与社会学“关系网络”理论阐释相结合，动态地、纵向地、深层次地呈现出外来农民工在都市里从“生存”到“生活”的变化，并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建构起适应新的社会空间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延伸了该群体的生存和生活范围。由于该文的论述是建立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密切互动的基础上，以大量的访谈资料为铺垫，从质性的研究方法而言，其建构主义的表达方式少了些先验的预设，并在具体场景中形成了对研究对象生活状况的呈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3) 民族志表述方面：可视为实验民族志的一个成功案例。文章以建构故事的叙事方式，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展现了一个都市外来群体“本土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感受，改变了传统民族志中只用“我”的陈述而没有“他”的表述的情形，也使文章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赵莉原来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接受的是社会学的科班训练，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执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的她为了继续深造随我研习人类学。这项研究的对象和研究场景对她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赵莉用足了那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先天优势”，正如她在本书中谈及自己选择“田野作业点”时多次（共计7次）使用“可遇而不可求”一词相仿，甚至抓住老妈当起了“调研助理”。对导师而言，指导她做这样一个个案研究（或者

说民族志研究)也只能是顺水推舟,而不可强求。而这本著作之所以能读来精彩,恰恰在于它不仅仅有生动的故事,而是有理论分析和经过逻辑推导得出的合理结论。如果缺乏理论头脑,那么其中许多值得深究以及有价值的东西就可能被作者“熟视无睹”地忽略,故事也就只剩下故事了。

我对农村仅有的些许了解大半得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在云南当“知青”插队的经历,对于农民工实在缺乏足够的体认。(“农民工”在那个年代即使有,情况也跟现在大不相同。)面对赵莉这么一个“不二”选题,作为导师,确有畏难心情。可喜的是,如今是一个“布衣可以傲王侯”的时代。所以,我真应该感谢赵莉的“被访者”——本书的被研究主体,以及包括赵莉母亲在内的各位支持、协助她完成书稿的人士,他们堪称该著作的“合作指导教师”,或者,依照实验民族志派的说法,著作的合作者。少了他们,何来精彩?

人类学先贤列维·斯特劳斯曾有言道:“社会学有时是人类学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构人类学》,第一卷,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92页)期望赵莉今后能够在特殊人类学的研究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加上乘的作品。

是为序。

胡鸿保

2011年11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的缘起	(1)
二 研究的意义	(3)
(一) 现实意义	(3)
(二) 理论意义	(5)
三 研究内容的确定	(6)
(一) 迁移	(6)
(二) 城市适应	(8)
四 研究方法	(10)
(一) 人类学主客位方法	(10)
(二) “主位研究”的可行性	(12)
(三) 收集资料的方法	(14)
(四) 分析方法:网络分析法	(16)
五 田野调查点——Y市	(18)
六 论文的结构安排	(19)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2)
一 社会网相关理论综述	(22)
(一) 格拉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与“嵌入性”理论	(23)
(二) “强关系力量”假设与“差序格局”理论	(24)
(三) 结构主义网络论	(27)

(四)资源论的社会网络理论与资本论的社会网络理论	(27)
(五)社会网研究展望	(29)
二 人口迁移的经济学研究	(30)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推拉理论”	(30)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新经济移民理论	(31)
(三)双重劳动市场理论	(33)
三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学研究	(33)
(一)农民工流动研究的两种分析视角	(34)
(二)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民工研究	(35)
四 人口迁移的人类学研究	(36)
(一)从文化变迁角度的人口迁移研究	(37)
(二)移民的社会适应性研究	(38)
(三)人类学与农民工研究	(39)
第三章 空间迁移:从农村到城市	(41)
一 搓澡服务业的兴起	(41)
二 “哥伦布”的故事:从孔老二说起	(44)
(一)奔波:从杂耍到搓澡	(46)
(二)趟路:从秦皇岛到 Y 市	(47)
(三)学修脚:和扬州搓澡工“抢饭碗”	(50)
(四)聚集:亲带亲、邻帮邻	(53)
三 农村的生活	(55)
(一)史前史:从拉板车到搓澡	(56)
(二)关于孔家和孔家的字辈谱	(58)
四 最初的打工经历	(62)
(一)漂泊的日子	(62)
(二)不堪回首的收容遣送	(67)
五 初到 Y 市	(70)
(一)选择留下来?	(70)
(二)搓澡:“汗领”生活的开始	(73)

六	小结	(80)
第四章	地位迁移:从搓澡工到包工头	(81)
一	从搓澡工到包工头	(81)
(一)	积累:站稳脚跟	(81)
(二)	扩张:包浴池“扒皮”	(84)
二	搓澡工:被“扒皮”的日子	(88)
(一)	谁被“扒皮”?	(88)
(二)	“扒皮”的终结	(93)
三	转行与回归	(96)
(一)	买车跑长途	(96)
(二)	回归老本行	(99)
四	小结	(102)
第五章	城市适应:从生存到生活	(104)
一	经济适应	(104)
(一)	初来乍到:生存	(104)
(二)	安营扎寨:生活	(106)
二	社会交往适应	(110)
(一)	关系的存续:和同乡的关系	(111)
(二)	关系的重构:和城里人的关系	(117)
三	心理适应	(124)
(一)	职业认同:“我”和“他人”眼中的自己	(125)
(二)	地域认同:半个Y市人	(134)
(三)	身份认同: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	(140)
四	小结	(149)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150)
一	是流动? 还是迁移?	(150)
二	搓澡工迁移的“推力”和“拉力”	(153)
三	迁移中的关系网络:一种嵌入性视角	(156)
(一)	强关系与初次职业流动	(157)

(二)弱关系与再次职业流动	(159)
四 城市适应的多维性.....	(161)
(一)经济适应: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	(162)
(二)社会交往适应:构建新的“社会空间”	(163)
(三)心理适应:一种自我认同	(165)
五 关于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说明.....	(169)
六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172)
(一)创新之处	(172)
(二)研究的不足	(174)
参考文献.....	(176)
附录.....	(186)
附录1:主要搓澡人物一览表	(186)
附录2:安徽搓澡工的关系网络图	(188)
附录3:访谈提纲	(189)
附录4:地图	(192)
附录5:照片	(193)
后记.....	(198)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的缘起

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至今已有30年的时间了，这一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笔者之所以把关注的目光指向了搓澡工这一特殊的农民工群体，是因为笔者的家乡——Y市出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遍布全市各地大小浴池中的外来搓澡工多数来自安徽阜阳临泉县的几个乡镇，出现了同一个地方的人（安徽阜阳）在同一个城市（Y市）从事同一个行业（搓澡行业）。这一搓澡工群体是伴随着搓澡服务行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第一批搓澡工，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早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做起了经营浴池的生意，随着都市洗浴业的兴起，搓澡行业也应运而生，很快搓澡工成为城市中休闲服务产业中的新职业。由于本地人不愿意从事这种下层的劳动，来自安徽阜阳临泉县的孔家兄弟就成了最早干这一行的人。没过多久，搓澡工在城市中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为了取得雇主的信任，同时也为了给亲属、同乡提供工作机会，孔家兄弟写信回家，甚至专程跑回去，动员自家亲属和村里的老乡，一个人带出来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些人也成了当时最早的一批“淘金者”。而后的几年，这种亲戚、老乡的“强关系链条”又延伸出新的“强关系链条”，产生“迁移的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家人、老乡带到了Y市，人数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如今的几百人。伴随着搓澡工的流入、流出，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两代搓澡工：第一代搓澡工（最初的探路

者)和第二代搓澡工(现今的从业者),孔家和马家分别是这两代搓澡工中最大的家族和“领头羊”。如同“浙江村”、“河南村”一样,这种独特的进城方式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同时,由于作者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亲历了第一代搓澡工在城里的扎根和生活,这些都有助于作者可以系统地将城市搓澡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历程完整地记录下来。

近些年来,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然而,由于中国乡村人口大规模地流向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因此学者们大多基于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中的农民工进行研究,例如对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深圳的“平江村”的研究,而对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的农民工研究则少之又少。虽然中小城市中的农民工没有大城市的农民工集中,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身居中小城市的农民工是否有与大城市农民工的不同之处?他们的迁移动机、生活状态、城市适应等各方面是否会有所不同?都很值得我们关注。正如 Li Zhang (2002) 所说:“从我的民族志调查资料和农民工的反映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生活状况、家乡和自己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自身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和经济位置。迁移者也很少认为自己组成了一个有共同身份和相同经历的均质群体。在中国,处于不同境况的迁移人口在重新塑造其个体和群体身份时,经济地位、来源地、性别、民族背景、居住地或居住方式等的差异,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的存在,制度上的社会排斥以及由制度排斥衍生出来的其他排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考察的并不是农民工是如何被排斥,而是想了解他们在制度排斥的背景下,作为新生代农民工^①他们的迁移

① 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是一个概念。官方所认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对农业、农村和土地并不那么熟悉的80后、90后群体。笔者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外出打工的群体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本书的“主角”——安徽搓澡工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本书的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是新一代的农民工。笔者对于这一群体的划分不是以群体的年龄作为划分依据的,而是根据他们流入城市时所处的时期来划分的。因此,本书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广义的概念,这一群体不仅包括官方认定的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还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开出外打工的60后和70后农民工群体。

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并从三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许多研究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正是由于网络关系的存在和“强关系”的作用，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从事同一个行业的现象。本书所研究的“搓澡工”群体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他们将原先以亲属和同乡的联系为纽带的乡村网络关系延续到所生活的城市，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原生纽带仍发挥着作用。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农村流动人口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成的关系纽带，是一种更容易走进他们的特殊生活的研究范式。以往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研究，多是站在宏观视角、采用定量的方法，对社会关系网络所发挥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行笼统的研究，缺乏对社会关系网络深入细致的分析。

因此，本书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入手，将搓澡工迁移与城市适应研究“嵌入”在社会网相关的理论框架下，运用人类学建构故事的叙事方式，将搓澡工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过程以及他们借助关系网络在城市中所营造的“生活世界”展现出来。具体而言，就是分析安徽搓澡工从农村向城市聚居和迁移的过程中，是如何借助网络关系获得工作机会的？是如何利用网络关系获得职业地位提升的？又是如何重构网络关系适应城市生活的？以及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具体表现在经济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上的状况如何？

二 研究的意义

（一）现实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现象，至今已有近30年了。从最初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只是小规模、小范围地流动，到今天将近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前，外出打工者被看成是无序的、盲目的人口流动，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已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最初被称为“盲流”群体，到“民工潮”的一员，再到今天的“准城市居民”，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应该看到，

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生活状况、城市适应和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性，取决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其中居住地或居住方式、打工所属行业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来自不同迁入地区、不同行业的农民工群体，丰富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的认识 and 了解。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关的农民工研究多是从社会学学科的视角出发，一些研究者与农民工之间有“距离”感的不介入研究习惯以及“客观”的叙述使得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结论都是有局限性的。本书尝试性地将人类学主客位的方法运用到农民工的群体研究中，通过建构故事的叙事方式将安徽搓澡工外出打工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讲述出来，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体会农民工最真实的主观感受，勾画出农民工进城以后的“生活世界”。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人都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行动者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的条件和后果都拥有大量的知识。”（吉登斯，1998，81—94）如果研究者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主动性和实践性，也就失去了对行动者的真正了解。可以说，这项关于安徽搓澡工的迁移和城市适应的研究，是将人类学主客位的研究方法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将农民工的真实声音和经验表达从社会和学术关注的边缘带到中心的一种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农民工流动现象对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的意义不言自明，而他们自身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然而一直以来，“标签化”、“污名化”这一群体的观点一直存在。一些研究“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工从事着又苦又脏且收入微薄的工作，是受到排斥的“边缘群体”，甚至认为他们是城市的下等人，是给城市带来混乱、犯罪等负面影响的外来者。这些研究看到的只是农民工的“弱性”，并将这种“弱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制度和政策，从而对农民工抱有一味的同情、可怜，并提出诸多制度和政策的建议。诸如此类的研究其实是没有给予这一群体应有的尊重，也没有让读者真正了解这一群体，甚至带来误解。在实践上，这样的研究反而会强化城市人与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扩大两者的隔阂。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部分农民工迁移到城市，不仅构成了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迁入地、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关于搓澡工的迁移和城市适应

研究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实践研究，因为他们迁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和城市进行适应和融入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本研究的展开能够让更多的人对这一群体的迁移和城市适应的实践过程予以关注，并希望能从应用的角度对制定“农民工帮助发展计划”做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贡献，体现了笔者对农民工客观、平等、关爱的人文关怀。

（二）理论意义

由于中国日常生活中“关系”的重要性，加之市场与组织的低效，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流动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应该说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农民工的迁移行为进行解释，不仅更有效力，而且更是一种容易走进他们的特殊生活的研究范式。因此，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的相关理论，将农民工的迁移和城市适应过程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框架下进行解释，可以进一步地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和丰富，还为今后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以往的社会网理论以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假设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力量”假设为典型。两人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就业领域的，其中格拉诺维特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所做的研究，而边燕杰是基于华人社会的背景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被分别称作是网络分析的“美国版”和“中国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基于中国的“乡土社会”的背景提出来的，这种差序格局其实就是在强调这种“强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的特殊意义和核心地位。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就是依靠费孝通所说的在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血缘、地缘的关系所提供的信息获得的，并随着从农村到城市迁移行为的发生，继而将原先以亲属和同乡的联系为纽带的乡村网络关系延续到所生活的城市。当有学者提出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适用性研究中进行反思的时候（张继焦，2004），笔者认为我们也应该对“差序格局”理论以及西方的社会网的相关理论在农民工研究中的适应性进行实践，这样不仅可以通过经验材料，寻求具体问题与相关理论的对话，也可以以此来丰富和发展相关理论的解释范围。

搓澡工从农村到城市的初次职业流动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过程。目前为止，不论是“推拉”理论、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